「高太尉」與「開封府」

安立志

文化什錦

《水滸傳》是小說，小說是虛構的，但在金聖嘆看來，「《水滸》勝過《史記》」，區別只在於，前者「以文運事」，後者「以文生事」。《水滸傳》中開封府審理林沖案，如同《紅樓夢》中應天府審理薛蟠案，雖是小說家言，總能看到現實社會的影子。

在《水滸傳》中，出身破落戶的高俅，只因鑽營權門，被道君皇帝宋徽宗「抬舉爲」殿帥府太尉，執掌了大宋帝國的軍權，在林沖案中可以視爲「權力」的一方。開封府作爲北宋政權的直轄市，在行政、司法合一的體制下，府尹同時也是法官，可以視爲「法律」的一方。身爲東京八十萬禁軍槍棒教頭的林沖，原是「體制內」的人，他的被誣，並非普通案件，分析其中權力與法律的互動，爲分析趙宋政權的政治運作，提供了一個有價值的標本。

案由簡單，證據充分，作爲「權二代」的高衙內，仗着「我爸是高俅」，欺男霸女，爲強佔林沖之妻，他通過高太尉設局，誣陷林沖手執利刃擅闖軍機重地，意在行刺。林沖落入圈套，如何處置呢？高俅命令把林沖「解去開封府，分付滕府尹好生推問，勘理明白處決。」（《水滸傳》第七回）一句「分付」，一個「處決」，這哪裡是案件移交，分明是不折不扣的上級指示！圍繞林沖一案，殿帥府與開封府，高太尉與滕府尹，一個權力，一個法律，其實質地位，顯然不在一個層級。如同葫蘆案中的賈雨村與小沙彌，滕府尹與孫孔目的庭外對話，對宋徽宗治下的政治結構，揭示的淋漓盡致。在權力與法律的關係上，小說是從四個層次遞進敘述的。

第一層次，林沖一案，人證俱在，冤情確鑿，當案孔目孫定鯁直好善，試圖加以周全，卻遭到開封府主要領導人滕府尹的拒絕。他未經審判，「有罪推定」。然而，林沖犯下的「這般罪」並不是法律判斷的結果，而是權勢預謀的誣陷。高太尉不僅「批仰定罪」，甚至連罪名都確定了，「定要問他『手執利刃，故入節堂，殺害本官』。」這說明，在專制政體之下，根本沒有司法獨立行使的空間，法槌只能聽命於權杖，而所有的法庭審理不過是對權力意志的確認與背書。

第二層次，孫定顯然不同意滕府尹的說法，他不無挖苦地指出：「這南衙開封府不是朝廷的，是高太尉家的！」金聖嘆就此批曰：「雖無孔目唐突府尹之理，然自是快語。」作爲「法律工作者」，孫孔目話雖不多，卻痛快淋漓地揭示了宋代法律的實質。在皇權制度之下，既然是皇帝的寵臣高太尉交辦的案子，那麼，法律和「法院」就不可避免地變爲「高太尉家的」「家法」和「私刑」。孫定的話，說到了制度的痛處，難堪的滕府尹只會加以斥責——「胡說！」

第三層次，這位孫孔目「鯁直」的只剩「一根筋」，索性扒開了高太尉家的「垃圾場」：「誰不知高太尉當權倚勢豪強？更兼他府裡無般不做，但有人小小觸犯，便發來開封府，要殺便殺，要剮便剮，卻不是他家官府！」金聖嘆在這段話中一則批語頗有意思：「言高府中則多犯彌天之罪耳，應殺應剮耳。」孫定這番話，極其深刻，一方面，眞正犯有彌天大罪的正是高太尉本人，另一方面，他的所有罪惡都是由司法機關與之共謀的。

第四層次，孫孔目一口氣說出高太尉的纍纍惡行，使得滕府尹啞口無言，只是訕訕地問道，「據你說時，林沖事怎的方便他，施行斷遣？」兩人合計的最後，仍然只能以司法機關本來就是「高太尉家的」這一事實爲前提，並將無辜的林沖定爲重犯，「刺配遠惡軍州」。這個結果，沒有改變冤案的本質，只是略微減輕了冤案的程度而已。即便如此，也還是在高太尉「情知理短，又礙府尹」的情況下達成的最好結果。不要以爲權力還有些許的憐憫與仁慈，高太尉決然不會放過林沖，後來發生的野豬林、草料場的謀殺事件，就是明證。在當今社會，經常碰到「權大還是法大」這樣的幼稚問題。當今之「法」，雖然叫作「國法」，當今之「權」，雖然稱爲「民權」，不要低估了傳統的慣性與文化的惰性。在「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體制下，「王法」其實是皇帝的「家法」，官員其實是皇帝的「家臣」。以林沖案爲例，「高太尉」的意志是凌駕一切的，「開封府」不過是權勢者整肅弱者的枷鎖與鐐銬。在「高太尉」與「開封府」的互動中，「高太尉」言出法隨，頤指氣使指，「開封府」如同奴僕與婢女，在「高太尉」的指使下，「開封府」倒成爲混淆是非，顚倒黑白的同謀與共犯。「體制內人」，尚且如此，遑論其他？

張聞天早期譯事一瞥

鄭延國

燈下集

中共早期領導人中不乏積極從事翻譯活動者，張聞天便是突出的一位。一九一七年十七歲的張聞天入南京國之河海工程專門學校即今之河海大學就讀，由是打下了堅實的英文基礎。一九二〇年，張聞天和茅盾的胞弟沈澤民結伴東渡日本留學，於是又將日語收入囊中，一九二五年張聞天受中共派遣，前往蘇聯學習，其語言庫存無疑又錦上添花，多了一門俄語。胸中擁有中英日俄四種語言，自然可以在翻譯的天地之中任意馳騁了，難怪他曾在「少年中國學會終身志業調查表」中稱：「終身欲從事之事業」是「精神運動」，「將來維持終身生活之方法」是「譯著」。

縱觀張氏的早期譯事，大致呈三種走向，即文學評論翻譯，文學作品翻譯，馬列著述和社會科學著作翻譯。其文學評論翻譯的主要體現是兩篇重頭文章。一篇是《托爾斯泰的藝術觀》，是文以直譯、闡釋、評述、概述相結合的方式，有系統地張揚了世界級大文豪托爾斯泰精湛的藝術見解。文章發表在一九二一年九月出版的《小說月報》號外《俄國文學研究》上。是文長達二萬餘字，凸顯了其嶄露頭角的翻譯能力與評介水平。另一篇是法國哲學家柏格森的文學專論《笑之研究》。張聞天於一九二一年十二月據柏氏親自校閱過的英譯本譯出，兩年後即一九二三年十二月，譯本首度梨行。這無疑是張氏對剛剛起步的中國美學研究的一大貢獻。

其文學作品翻譯涵蓋甚多，有小說，如英國作家王爾德的《獄中記》（與汪馥泉合譯），俄國作家柯羅連科《盲音樂家》；有詩歌，如黎巴嫩詩人紀伯倫的散文詩；有戲劇，如俄國安特列夫的四幕劇《狗的舞蹈》，意大利鄧南遮的名劇《琪娥康陶》（又譯《江孔達》）以及西班牙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倍那文德的劇本《熱情之花》和《僞善者》。耐人尋味的是張譯倍那文德居然引起了魯迅的高度關注。魯迅讀了張譯之後，特意從日本作家廚川白村的論文集《走向十字街頭》中譯出《西班牙劇壇的將星》一文刊於《小說月報》第十六卷第一號上，「以供讀者參考」，並稱「所引劇文，用的就是張聞天先生的譯本」。

其馬列著述和社會科學著作翻譯則包括：德國社會學家米勒·賴爾《社會發展史》一書的最後一章《文化和幸福》，一九二二年譯出，載上海《東方雜誌》第十九卷第二十號；《蘇維埃俄羅斯政策之發展》，載一九二三年一月《民國日報·覺悟》；馬克思《法蘭西內戰》，一九二八年與吳亮平合譯。顯而易見，這些譯文爲馬列主義在中國的傳播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此外，他還翻譯過美國人房龍的《人類的故事》，後易名爲《西洋史大綱》，凡二十七萬餘字，手稿分裝三冊，一九二四年譯畢，一九二五年寄上海中華書局。孰料這部譯稿竟在中華書局的圖書館裡靜靜地躺了整整七十八年，直到二〇〇三年方由上海辭書出版社影印出版，此時距張聞天逝世已經二十八個年頭了。

除了翻譯實踐之外，張聞天亦有自己獨到的翻譯見解。如他曾撰有《譯名的討論》一文，發表於一九二〇年四月十七日的《時事新報》上。此文針對白話文翻譯國外學術著作起步階段譯名混亂的現象，提出譯名務求「統一」，無論是音譯、意譯，還是另創新詞，必須讓大衆了解這個新詞的意思，力避誤解。爲此，他建議編一部英漢對照的《新名詞字典》。他在是文中還倡議翻譯評介工作一定要消除三弊即「閉門造車」、「故爲歧異」、「盲目服從」。

今年適逢中國共產黨創立九十周年，在這大喜大慶的時刻，緬懷張聞天的這些翻譯業績，興許會給後人，特別是給從事翻譯工作的年輕人以更多的激勵與啓示吧！

好船夫

——聖雄甘地揚帆來到中國

鄧俊秉

人與事

二〇一〇年是中印兩國建交六十周年，也是從未涉足我國的印度國父聖雄甘地誕辰一百四十一周年。作爲一個退休九年的外交老兵，欣慰的是，我的譯作——甘地嫡孫拉吉莫漢·甘地教授撰寫的《The Good Boatman, A Portrait of Gandhi》（中文譯名爲《我的祖父聖雄甘地》）歷經了長達七年的時間，去年終於在北京面世。這不僅完成了我個人多年來的夙願，而且爲推動中印兩國人民之間的了解和友誼盡了我的一點微力。更令我驚喜的是，去年三月，國務院新聞辦的中國網將這本譯作有關的故事製作成一個精緻的光盤作爲兩國建交花甲之年的獻禮。下面，我想如實地向讀者介紹有關聖雄甘地，這個好船夫，是如何「駕船」來到中國鮮爲人知的故事。

先談談我是如何直接和間接地結識了聖雄甘地的三位晚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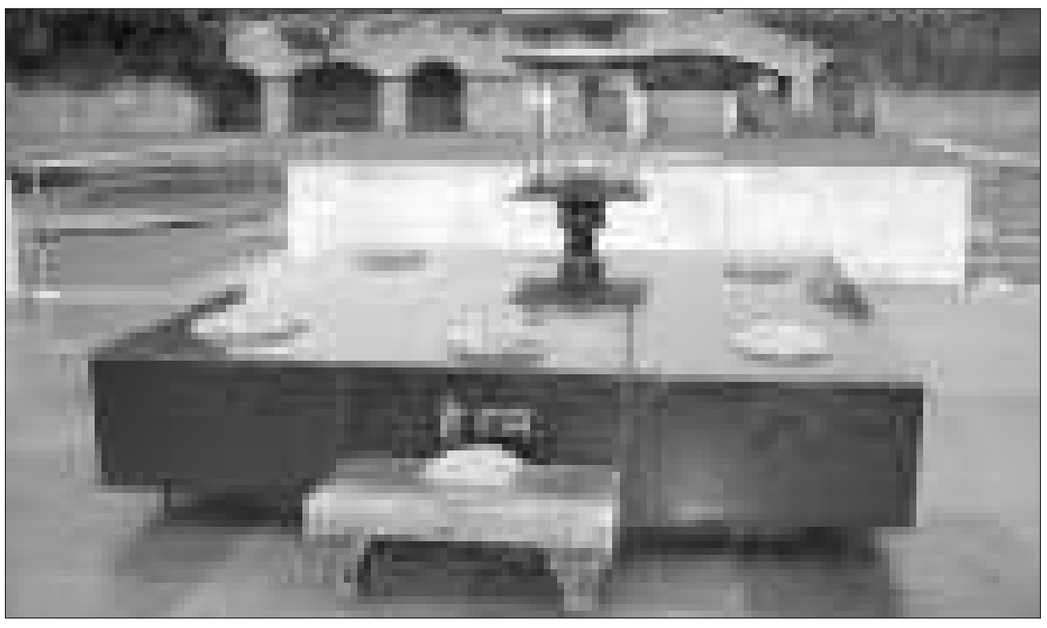
我隨丈夫周剛大使於一九九八年四月下旬抵達新德里不久，就有幸結識了聖雄的孫子戈帕爾克里什納·甘地。六月一日，在印度總統府爲周剛舉行的國書遞交儀式時，認識了他，這位納拉亞南總統的首席秘書。英俊瀟灑、彬彬有禮，他對我們十分熱情友好。從此以後，爲協助我們同印度總統夫婦建立親密的關係，他發揮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後來，他成爲印度外交界的一位知名外交官，任印度駐斯里蘭卡高級專員。前幾年回國後，出任西孟加拉邦邦長，成爲一名重要地方大員。前年秋季，當他收到我的這本譯作後，非常興奮地回信說，「欣接來信，愉快地回憶起在現已作古的納拉亞南總統手下工作時有幸結識你們的時光。感謝將我兄弟拉吉莫漢·甘地著作的中文譯本贈送於我。我們在北京的使館爲你的譯作舉行了發行式確是一大喜事。請接受我的衷心感激和良好祝願。對於加強我們兩個偉大國家之間的關係，我充滿信心。」

二〇〇〇年十二月十九日，聖雄的孫女塔娜甘地·巴塔恰爾吉——「甘地宣傳紀念委員會」副主席，一位知名的社會活動家，特地來到中國大使館拜訪我。我們一見如故，相聚甚歡。臨行前，她將聖雄的另一個孫子，她兄弟拉吉莫漢·甘地撰寫的這本書贈送給我。我非常感謝她爲了增進中國朋友對印度國父的了解而送書的好意，並向她表示我一定仔細閱讀此書，以增強對聖雄甘地偉大的一生和他領導的印度獨立運動的認識。光陰似箭，當她在分別長達九年後收到我回贈給她的該書中文譯作後，熱情洋溢地回信說：「非常非常感謝！我無法想像好船夫竟同你一起航行到中國。你們偉大的國家始終令我神往，希望有朝一日訪問貴國。」

二〇〇一年六月下旬，周剛和我從印度離任，回到北京。眞正退休以來，我才有空閒時間閱讀此書。在閱讀過程中，心中又燃起了我最後的夙願：將它譯成中文，介紹給中國讀者，以便他們更好地了解聖雄甘地和他的祖國。（之前，我先後翻譯了英國前首相愛德華·希思的《音樂，我終身的樂趣》、《阿尤布·汗——巴基斯坦首位軍人統治者》等書）。我雖然了解作者拉吉莫漢·甘地教授是位知名學者、傳記作家和媒體評論家，撰寫了印度政要和南亞事務的知名著作，如《報復與妥協——了解南亞歷史》和《帕特爾的一生》等書，卻不認識他，更不知他當時在何處。得不到作者的首肯，我是無權翻譯此書並請我國出版社出版其中文版本的。這個難題終於得到我丈夫周剛（中國駐印度前大使）的朋友——印度駐華大使謝夫尙卡爾·梅農的熱情幫助而順利解決了。我們結識他和夫人是在上世紀八〇年代中期他出任印度使館的副館長期間。二〇〇一年一月，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李鵬和夫人訪問印度時，周剛和我以及他和夫人作爲兩國使節夫婦陪同訪問。我於二〇〇三年初同正在美國伊利諾斯大學任客座教授的該書作者拉吉莫漢·甘地取得了聯繫，他非常樂意幫助我實現我的願望，將其祖父和當時的印度介紹給中國人民，欣然同意我作爲他的全權代表，負責翻譯和推動出版等具體事宜。在翻譯和出版的漫長過程中，我經常同他通信聯絡，告知有關的進展情況，他衷心感謝我爲此書中文版的問世所付出的巨大努力和辛勤勞動。此後，他爲該書的光盤寫了以下的感言：「對於我們世界的未來來說，沒有多少事情比中印這兩個人口大國之間眞正的相互理解更爲重要的了。鄧俊秉教授將我的《The Good Boatman, A Portrait of Gandhi》譯成中文版，爲深化這一必要的理解邁出了有意義的一步。」

回顧此書中文版經歷了長達七年的歲月才得以問世，雖很坎坷，卻更有意義。我從二〇〇三年開始筆耕（當時還不懂如何用電腦打字），花了約三年的時間，完成了八百頁中文譯稿。由於該書不僅僅是一本刻畫聖雄甘地一生、他的思想和主張的著作，更是一本涉及印度社會和其現代歷史的巨作，我請老伴周剛花了大半年的工夫，仔細審閱了我的中文手稿。他早年畢業於莫斯科國際關係學院南亞專業，大半輩子外交生涯與南亞事務有關。一九八八年至二〇〇一年，他先後任駐馬來西亞、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亞和印度的大使；退休後，作爲資深南亞問題專家，一直從事南亞民間外交。鑒於中國書市商業化的影響，該書出版社遲遲未能推出其中文版，我又花了三年時間盡力推動，最後在有關領導的幫助下，該書中文版《我的祖父聖雄甘地》終於在二〇〇九年八月初面世了。

在此書艱辛而漫長的翻譯和出版過程中，梅農大使的兩位後任更是給予了眞誠而熱情的幫助。蘇里寧大使於二〇〇三年至二〇〇六年在任期間和夫人普娜不僅十分關心我的翻譯進程，並且主動提出爲此書中文版舉行發行式作爲慶祝二〇〇六年印中友好年的一次活動。然而，蘇里寧大使於當年十月初調回新德里就任印度外交部秘書（相當於副部長）。回國不久，他就在十月下旬專門爲此書中文版寫了感人的前言：「……鄧俊秉教授的譯作將給中國讀者提供一個難得的機會觀察現代印度歷史最爲關鍵的階段。這將有助於他們理解、領會、吸收並且希望他們應用聖雄推崇的和平、非暴力和社會友愛……」拉奧琪大使於二〇〇六年十月就任以來，始終關心此書中文版的出版。她熱情提出作爲開啓使館文化中心的首次活動，她將親自爲該書舉行發行式。然而，直到她離任前，該書也未能出版。二〇〇九年六月二十九日，應中國網的邀請，我、周剛和拉奧琪大使共同爲此書做了一個專訪。事後，該網站將此專訪製成光盤特地贈送給中印雙方。拉奧琪大使於七月中旬離京前，明確向其副館長馬宗達公使交代，一旦該書面世，由他來主持發行式。（上）



聖雄甘地墓（資料圖片）

大自然的恩賜

陳志宏

人生在線

有一次，女兒滿臉疑惑地問我：「老爸，泥土是什麼？」

老天，居然連泥土是什麼長啥樣都不知道，作爲她的父親，我該高興還是悲哀？曾經，我爲自己灰頭土臉而自卑懊惱不已：曾經，爲跳出農門，苦讀苦熬，終於天遂人願。我終於逃離了泥土，以致於讓我的孩子落到不明泥土爲何物的尷尬境地。也就是這些年，面朝黃土背朝天的「農民」，成了罵人的話……

春天飄香的泥土，夏日跳舞的塵埃，秋雨裡道路的泥濘，冬雪下蜂窩狀的凍土……都遠去了，鋼筋混凝土，將這一切隔斷在女兒的視線之外，她住在水泥森林裡，出門，道路都被水泥或者柏油硬化，每一寸空地都被馬尼拉草綠化，哪能見到泥土的影子呀？即便這樣，孩子她媽還是千叮嚀萬囑咐：「不要到處亂跑，小心泥灰搞髒了衣服！」現在的父母，對於孩子們玩鬧都會提心吊膽，怕泥土灰塵弄髒了漂亮的衣服，怕沾染了細菌，怕傳到病毒……一千個小心，一萬個不放心。以爲將孩子隔離了髒污，才是講衛生，安全的。髒了衣服，是小事，洗洗就好了，更主要的是怕孩子因爲不乾淨，而生病。爲人父母，爲孩子都無二心，都爲孩子好。爲了孩子，甚至可以犧牲自己的一切。

父母的關心和疼愛，都好理解。有一個不容忽視的現象是——城市裡乾淨的孩子，動不動來個感冒，生場小病，小時候我們這幫鄉下孩子，一年半載也難得去赤腳醫生那裡打針吃藥。看來髒與淨，遠不是眼見爲實那麼簡單。世界上影響巨大的兒童教育類圖書《窗邊的小豆豆》中，小林校長說：「請讓孩子們穿最不好的衣服到學校來吧！」值得爲人父母者深深體會，認眞反思。小林校長就是擔心孩子弄髒衣服，回家要受到父母責備，更怕孩子衣服玩破了不好意思和大家玩，才提出如此要求。他鼓勵所有的孩子盡情地玩，衣服弄破或者滾成泥猴，都沒關係。放開來玩，玩得開心，才是最重要的。無數實踐證明，讓孩子盡情地玩，才是最好的早教。對於細菌的擔心，醫學上已有定論，若是總處在無菌的眞空狀態，一旦有細菌侵入，孩子不患病才怪呢。在跟細菌和病毒打交道的同時，也是在鍛煉孩子的抵抗力，增強孩子的免疫力。不要怕孩子弄髒衣服。年輕的父母們不妨聽聽泰戈爾《吉檀迦利》中的詩句：不要怕你孩子美麗的衣服沾染塵埃，那是大自然的恩賜……讓孩子們親近泥土吧，在塵埃中快樂地玩耍，十分珍惜大自然的恩賜，而不是排斥。父母們更要精心呵護好大自然這一妙不可言的恩賜，讓孩子在親近自然中，健康快樂地成長。

燕子

張業松

東西走廊

很久沒有見到燕子了。那天去弗雷明翰（Framingham）郊遊，回程在車站旁邊的電線上看到一對棲鳥，有點像是燕子，但看起來圓圓胖胖的，終究不能確定。

忽然接到小妹的來信，說：「你看昨天的相片，有一張兒子和他同伴合影的，往客廳看過去，燈管上面有一個新建的燕子窩，看到沒有，前幾天我們幾個人在家裡沒事坐着聊天時，突然有兩隻小燕子飛進來，在家裡飛來飛去，嘰嘰喳喳的可能是牠們倆個討論看是不是就在這家建新窩吧，討論了半天，最後飛走了，結果天黑時又雙雙飛回來了，就在燈架上蹲着過了一夜，第二天上午時牠們就開始銜草那些什麼的開始在燈架上建牠們的窩了，雖然把家裡弄得很髒，但是爸和媽說燕子進家裡建窩很好的，所以我們也就不理會牠們弄得髒了。」

我趕緊找出她前一天寄來的電子照片，放大，調正，果然從孩子身後的背景裡找到了所說的燕子窩。在貼牆的熒光燈管的一端，看起來小小的，還沒完工的樣子。燕窩是銜泥帶水壘起來的，建在燈管和基座的接頭處，會不會引起電線短路？在燈管旁邊的牆上架一塊板，專門給燕子做窩怎麼樣？越洋電話打回去，持有電工職業資格證的妹夫說，不要緊，電極是藏在基座裡面的，這支燈管平時不怎麼開，而且燕子工效高，兩天的工夫已經把窩建好了。

我放了心，回頭有點替現在的燕子可憐：高速「發展」之下，我們那裡的民居大多改成了磚混結構的小樓，室內室外橫平豎直，立面光滑，加上門開得小了，常常關着，即使進得去，牆上簷下也很難找到落腳之地，這要眞是「昔日堂前燕」，回來了豈不憋屈？燕子的壽命很長，據說有十多年。牠們的習性，是在一處築巢之後，年年都會回來，每年生養一至兩窩後代，總數十隻左右。小燕子長大之後也不會離開父母很遠，有時會在同一屋簷下另建新窩。新聞裡偶有此類消息，某地農家一戶兩窩燕子，某地立交橋下上千隻燕子群棲，視爲異事。仔細想想其實不應該大驚小怪的。燕子本是群棲生物，冬季南遷到海島生活，也是成群結夥同巢一處，於是乃有「燕窩」這種東西。

當然不是所有的燕子窩都會成爲昂貴的「燕窩」，但至少中國常見的幾種燕子，家燕，雨燕（樓燕），金絲燕（所產燕窩稱官燕、白燕或黃燕）等，習性都差不多，春來秋返，有信有情。吳冠中的畫裡說：「日暖風和北國春，燕子來尋江南人。」江南的春天，江南的故家，曾經年復一年陪伴我們兄妹長大的燕子，又飛回來了！回來的該是老家燕的多少代孫呢？科普書裡說，亞洲燕一般都在菲律賓、印度、馬來半島、新幾內亞、澳洲的北部等地過冬，有時候也會到台灣島北部，飛越大海是遷徙過程中最大的危險和難關。據統計，在當年孵出的小燕中，八成左右都要犧牲在旅途上。牠們容易麼！「翩翩堂前燕，冬藏夏來見。兄弟兩三人，流宕在他縣。」這是漢樂府《艷歌行》裡的句子，它的結句是：「遠行不如歸。」小妹的信寫得眞好，讓我想得很多，閒時腦子裡全是燕子燕子燕子。

我想我是懷舊了，而且有點兒嚴重。

北崑的遺憾

鄧小秋

文化經緯

崑曲，作爲「非遺」的寶貴財富，在清末民初已日趨沒落，奄奄一息。但是，很多有識的崑曲愛好者與前輩藝人，都認識到它具有相當高的藝術性，便自覺地組織起來，進行學習、輔導與保護。在他們的努力下，到了民國時期，崑曲雖然日益蕭條，但也出現了一批優秀的表演藝術家。在南方，有「仙霓社」的朱傳茗、張傳芳、周傳瑛、王傳淞、沈傳芷、鄭傳鑒等「傳字輩」老藝人。在北方，同樣也有着「榮慶社」的侯益隆、王益友、韓世昌、郝振基、陶顯庭與白雲生、侯永奎等「榮字輩」老藝人。他們都是久經舞台鍛煉，身懷絕技，唱做俱佳，有着高超的藝術水平。

南北派的崑曲，風格各異，地方特色比較鮮明。南派的演唱，比較宛轉細膩。北派的演唱，則趨於高亢激昂。兩者各有所長，都深受觀衆的歡迎。在演出劇目方面，除了《牡丹亭》、《西廂記》等共有的劇目以外，「南崑」常演的《刀會》、《思凡》、《跪池》、《醉寫》等，「北崑」常演的《安天會》、《夜奔》等，都互有特色，具有很高的觀賞性與藝術性。然而，由於種種原因，到了建國以後，「南崑」欣欣向榮，繁花似錦，後繼有人，取得了很大成就，令人刮目相看。他們演出衆多質量上乘的優秀劇目，培養了許多技藝出衆的接班人。相比之下，「北崑」的特色劇目越來越少，並且後繼乏人，就顯得有些相形見絀了。

「南崑」的藝人，在建國以後，受到當地文化部門的重視，都能夠發揮自己的藝術特長，大顯身手，成績斐然。如浙江的周傳瑛、王傳淞，演出了轟動全國的《十五貫》，「一齣戲救活了一個劇種」。並且壯大了後備力量，湧現了以王世瑜爲代表的「世字輩」。江蘇的張繼青、范繼信等「繼字輩」，則以《痴夢》、《驚夢》等劇目的精彩演出，在國際上也取得了很大的影響。如今新秀輩出，也有了像柯軍那樣的領軍人物。而在上海，更是集中了「南崑」的精英人才，俞振飛、言慧珠與衆多的「傳字輩」老藝人們，一直堅持繼承優秀的傳統藝術，挖掘、整理了上百齣的優秀傳統劇目，經常示範演出。他們對搶救遺產、整理傳統劇目、培養青年演員等方面，都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除了能在崑劇舞台上保留了一大批光彩奪目的優秀劇目以外，還培養了蔡正仁、華文漪、岳美緹、計鎮華、王芝泉、梁谷音等傑出人才，造就了一大批「大師級」的崑曲藝術家，起到了承前啓後的重要作用與貢獻。

然而，建國以後的「北崑」前輩藝人，雖然在演出實踐、劇目積累及藝術聲望等方面，並不比「南崑」遜色。並且，在一九五七年還正式組建了「北方崑曲劇院」，曾排出新戲《紅霞》、《晴雯》等劇。問題在於，由於一些官員，長期的熱衷於排演新戲與現代戲，熱衷於所謂的「創新」，忽視了對傳統劇目的保護與搶救，以致於一批身懷絕藝的「北崑」老藝人們，有力無處去施，蹉跎歲月。半個多世紀以來，白白浪費了寶貴的光陰。人員凋零，撒手而去。直到現在，就沒有能像「南崑」那樣，留下相當一批具有「北崑」特色的優秀傳統劇目。更沒有像「南崑」那樣，培養出一大批「大師級」的正統傳人。這，不能不說是戲曲界一個很大的遺憾與巨大的損失。由此可見，戲曲的振興與發展，應該從保護、搶救與扶持本劇種的傳統藝術做起，替青年人打好扎實的基礎工作。如果不做好實實在在的傳承工作，侈談「創新」，妄言「改革」，日後必將一事無成，後患無窮。